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49期 2013年6月,頁341-368

DOI: 10.6243/BHR.2013.049.341

# 關於宋代「重文輕武説」的幾點反思\*

宋彦陞\*\*

#### 摘要

長久以來,宋代「武事不彰」的歷史形象似乎深植人心。研究者在探討宋代為何「積弱」之時,常把原因歸結於宋代「重文輕武」所造成的影響。隨著此論調的逐漸發展,宋代「重文輕武說」儼然已成為說明宋代文武關係的解釋典範。在這篇文章,筆者試圖呈現宋代「重文輕武說」的形成過程,並從以下三方面對此說法提出疑難:此說法是否具備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兩宋的文武關係是否始終一成不變?輕視武人、武事是否為宋代文人的共識?筆者認為,宋代固然有其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將武略的一面,然而,此情形既非宋代的特有文化,亦不是一個全然有效的基本預設。學者在開展宋代的相關討論時,最好不要直覺地將「重文輕武」視為研究的先決條件,才能避免此觀念所造成的思想窠臼。

關鍵詞:宋代、重文輕武、崇文抑武、文武關係、政策

<sup>\*</sup> 本文在出版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sup>\*\*</sup>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 一、前言

或許是因為宋代疆域不及漢、唐,加上先後亡於女真、蒙古等外族,以往學界以及一般大眾對於宋代總是抱持著「積貧積弱」、「武事不彰」的印象。為了探究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有學者認為「重文輕武」很可能是造成此現象的重要因素。「受此影響,長久以來,無論是歷史教科書,還是專書、論文,在談及宋代的立國方針時,經常使用「重文輕武」四字對宋代的文武關係加以定調。

在學界約定俗成的使用下,「重文輕武」一詞不僅成為宋代文武關係的解釋典範,甚至,在一些前輩先進的論著中,更將此觀念當作研究宋代不證自明的前提,較少思考「重文輕武」一詞所代表的意涵為何,以及此概念在兩宋三百年間又是如何發展。2直到最近,已有部分學界前輩對宋代「積貧積弱」的說法提出質疑。3此外,有些學者亦注意到宋代「重文輕武」的現象實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不僅隨著時間、地域有所差異,不同文士看待武人、武事的態度亦相差甚大。更有甚者,若跳脫宋代的時代框架,對中國的歷史進行整體觀察,不難發現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將武略的情形實非宋代的特殊現象。

事實上,當國家處於戰亂或尚未統一之時,武人、武事常為時人所重;反之,若時代承平、官員有正常的升遷管道,文人、文事則相對容易獲得尊敬。初唐至宋代建立的這三百餘年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根據陳寅恪(1890-1969)的研究,初唐官員經常給

劉子健,〈略論宋代武官群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收於氏著,《雨宋史研究彙編》 (臺北:聯經,1987),頁173;傅樂成,《中國通史》(臺北:弘揚圖書有限公司,2005),頁529。

<sup>2</sup> 關於此現象,請參考筆者第三節至第五節的論證。

<sup>3</sup> 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3:3(西安,2004.5),頁75-78。頗有意思的是,李氏注意到宋廷面臨遼、金、 蒙古等強大外患皆能長期維持對峙之局,實力不可謂之不強。若是如此,與「積 貧積弱說」密切相關的「重文輕武說」似乎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人「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的印象。<sup>4</sup>但是,到了武后(624-705,690-705 在位)掌權時期,當時已出現文官不願意轉任武職的現象。開元年間,玄宗(685-762,712-756 在位)曾言:「皇家故事:諸衛大將軍共尚書交互為之,近日漸貴文物,乃輕此職。」<sup>5</sup>生長於中晚唐的杜牧(803-852)亦在〈注孫子序〉一文對士人「不敢言兵」、「恥言兵」的現象發出感嘆。<sup>6</sup>

到了晚唐、五代,文人價值觀受到嚴重衝擊,進而發生變化:一方面,部分文人(如敬翔、李振、桑維翰等)與藩鎮合作,以求在決策上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部分文士(如焦繼勳)選擇棄文從武,以投入武事作為建立功業的途徑,甚至更以擔任武職為榮。<sup>7</sup>當後周、宋代相繼建立之後,如何調整文武關係,便成了當代統治者的重要課題。限於學力與篇幅,筆者並不打算對中國歷代的文武關係多做討論,只是希望提醒讀者: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將武略常是中國許多朝代的共通現象。之所以會把「重文輕武」當作宋代的刻板印象,很可能與學界研究中國史時「斷代治史」的傾向有關。<sup>8</sup>「斷代治史」的習慣,容易使我們忽略不同朝代經常出現的共同現象。關於跨越斷代研究的侷限,李立曾以宋代「祖宗之法」議題為例,提出了一段精闢的論述,筆者認為用於宋代「重文輕武說」亦頗為貼切,茲引於下:

明清雨代的史料中亦不乏關於祖宗之法的論述,實際上,

<sup>4</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仁書局,1994), 頁200。

<sup>5</sup> 關於此現象,方震華在其博士論文已有提及,見 Cheng-hua Fang (方震華),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pp. 12-16. 另外,高明士從朝位、勳官制度等層面進行觀察,得到「官僚制中,武官地位終究不如文官」的結論。見高明士,〈唐朝的文和武〉,《文史哲學報》,48 (臺北,1998.6),頁145-167。

<sup>6</sup> 唐·杜牧,何錫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點校本),卷 10,〈注孫子序〉,頁722。

<sup>&</sup>lt;sup>7</sup>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pp. 84-89.

<sup>8</sup> 關於此現象的討論,見方震華,〈傳統領域如何發展?——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臺大歷史學報》,48(臺北,2011.12),頁165-184,特別是頁173。

與其說這是宋代政治上的特殊性問題,不如說是自宋以降 王朝政治的普遍性問題,如果不能在更廣闊的空間和更長 的時段內進行研究,而是專注於宋代,結果只會是把某一 方面孤立地片面地誇大拔高。<sup>9</sup>

研究者若能突破斷代治史的限制,對跨時代的共通現象投入更多關注,相信更能把握歷史演變的脈絡。綜上觀之,宋代「重文輕武說」的解釋典範顯然已有不少尚待修正、補充之處。是故,以諸位前輩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此說法重新提出反思,便顯得有其必要。在這篇文章,筆者希望重新檢視宋代「重文輕武說」的提出,並對以下三方面——此名詞是否具備清楚定義、文武關係在兩宋三百餘年是否一成不變、輕視武人武事是否是宋代文人的共識——提出幾點反思。透過對宋代「重文輕武說」的重新檢視,筆者希望學界日後在使用「重文輕武」一詞之前,能仔細思考、定義此名詞的內涵,並了解其解釋性實有其限度,不宜過度使用。

# 二、宋代「重文輕武說」的提出

以往,對於治中國史(尤其是治宋史)的研究者而言,宋代「重文輕武」的形象深入人心,不少研究成果更聲稱「重文輕武」是宋代立國以來的原則、國策、家法等。<sup>10</sup>受此影響,宋代「重文輕武說」幾乎已成為描述宋代文武關係的解釋典範。根據

<sup>&</sup>lt;sup>9</sup> 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收於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20-39,特別是頁37。

<sup>10</sup> 如張元、李孝悌合著,《簡明中國歷史》(臺北:龍騰文化,2002),頁146;陳峰,〈試論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收於氏著,《宋代軍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1-17,特別是頁3-11;黃寬重,〈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歷史月刊》,8(臺北,1988.9),頁64-69,特別是頁66。甚至,有些論文標題更直接贊同宋代曾落實「重文輕武政策」的說法,見李貴泉,〈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與武將的關係〉,《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4(廣州,2002.4),頁52-61;田耕宇,〈宋代右文抑武政策對宋型文化形成的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6:2(成都,2005.2),頁209-216。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 100年 5 月發布的〈修正「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歷史課程綱要〉所載,「重文輕武」與「中央集權」、「強幹弱枝」等詞皆被視為宋初為矯正唐末五代的變局,所實行的改革之策。<sup>11</sup>然而,部分學者卻對宋代「重文輕武」的說法提出質疑。Peter Lorge 在其論文中便指出宋代從西元 960年建國,一直到1279年亡於蒙古,從來沒有名為「重文輕武」的政策。<sup>12</sup>事實上,「重文輕武」四字並未出現在宋代史籍中,而是最早見於明代小說《二刻拍案驚奇》。<sup>13</sup>小說原文如下:

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名自辯,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為妙,仁兄不要輕率。」<sup>14</sup>

由先前段落有「兵備道」、「參將」等官名推斷,此處的「而今」 指的是明代,而非宋代。必須注意的是,《二拍》並非唯一以「重 文輕武」描述明代的當代著作。與《二拍》成書時間相近的左光 斗(1575-1625)、張煌言(1620-1664)等人亦曾以「重文輕武」 一詞形容身處的明代。<sup>15</sup>也就是說,「重文輕武」四字在使用伊

<sup>11</sup> 這份課網可在教育部的網站查得全文:http://edu.law.moe.gov.tw/NewsContent.aspx?id=625 (檢索日期:2013.8.2)。據教育部網站所載,此課網已於101學年度開始實施。筆者翻閱了幾本據此課網寫成的高中歷史課本,亦皆採用宋代落實「重文輕武」之政的說法。見高明士主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2》(臺南:翰林出版社,採行民國100年課網),頁130-131;王仲孚主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2》(臺北:康熹文化,採行民國100年課網),頁126-128。當然,教科書刊載此說已行之有年。從最新發布的歷史課程網要仍特別提示此說來看,宋代「重文輕武說」至今仍是歷史教學的主流意見。

<sup>12</sup> 當然,沒有以「重文輕武」為名的政策並不代表宋代沒有「重文輕武」的現象。只是,所謂的「重文輕武」究竟所指為何?「重文輕武」真的是宋代的主流觀念嗎?關於這些問題,筆者將在以下章節進行討論。

Peter Lorge, "The Northern Song Military Aristocracy and the Royal Family," *War and Society*, 18: 2 (October, 2000), pp. 37-47.

<sup>14</sup>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2007點校本,以下簡稱《二拍》),卷 17,〈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頁345。

<sup>15</sup> 明·左光斗,《左忠毅公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比例建立武學疏〉,頁569a;明·張煌言,《張忠烈公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與台州鎮張承恩書〉,頁300b。

始,並非用來形容宋代,而是晚明時人對當代的印象。

到了清代,「重文輕武」一詞所描述的對象開始出現變化。就筆者所見,清人以全祖望(1705-1755)首開宋代「重文輕武」之說。<sup>16</sup>這種說法自清中葉後逐漸盛行,薛福成(1838-1894)、張之洞(1837-1909)、皮錫瑞(1850-1908)等人都在奏議或著述中以此四字描述宋代,彷彿已成為當時的通說。<sup>17</sup>然則,宋代「重文輕武說」又是何時見於現代歷史學界?據 Peter Lorge 的研究,他認為最早以此四字形容宋代的學術著作,當為史家方豪(1910-1980)所著的《宋史》。方氏原文如下:

宋初之重科舉,固欲牢籠之意,亦所以養成重文輕武之政,然太宗實亦有求才之意,故初即位,即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sup>18</sup>

方氏認為宋代之所以重視科舉,在於意圖形成一種「重文輕武」的政治局勢,並將落實此策的時間點定位於太宗朝,而 Peter Lorge 則認為此首開將「重文輕武」一詞描述為宋代國策 (Song dynasty policy) 的先例。<sup>19</sup>不過,方氏這段文字並未賦予「重文輕

<sup>16</sup> 清·全祖望,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點校本),卷39,〈右科取士規制議〉,頁1557。

<sup>17</sup> 薛福成之文,收於清·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51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卷56,〈選將練兵論〉,頁855;張之洞之文,收於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萬有文庫第2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199,〈張之洞學堂歌〉,頁9483a;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90。值得注意的是,薛福成聲稱「重文輕武」是宋、明以來的現象,可見其認為「重文輕武」並非僅出現於一朝一代,而是一種長期的流變。

<sup>18</sup> 方豪,《宋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0),頁74。此書最早於1954年出版,此處為2000年版的頁碼。

<sup>19</sup> 據筆者所見資料,自民國38年之後,最早以「重文輕武」一詞形容宋代的大陸學者,當為鄧廣銘於1980年發表的論文〈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收於氏著,《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75-103,特別是頁77。值得注意的是,鄧氏對於「重文輕武」的定義不只與錢穆極為相近,連行文都頗有相似之處。據劉浦江的研究,鄧氏早年曾協助錢穆點校、整理《國史大綱》的相關資料。是否因此受到錢氏影響,則不得而知,見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歷史研究》5(北京,1999.10),頁

武」一詞明確的定義。相較之下,錢穆(1895-1990)完成於抗戰時期的《國史大綱》雖然沒有直接使用「重文輕武」四字,卻提出了類似的概念,並宣稱此為宋代「家訓」:

收復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歷世相傳的一個家訓。但是不能再讓軍人操握政權,亦是宋王室歷世相傳更不放棄的另一個家訓。宋室既不能蕩平北寇,自然不能做消兵之想,而同時又不讓軍人操握政權,故宋王室的第三個歷世相傳的家訓,厥為優待士大夫,永遠讓文人壓在武人的頭上。<sup>20</sup>

根據錢氏其後的引文,其似乎認為此家訓奠基於太祖朝。在此, 錢氏雖然並未使用「重文輕武」一詞,其對宋代文武關係的定義,卻經常被用作解釋「重文輕武」四字的內涵,如傅樂成 (1922-1984)在其所著《中國通史》便認為所謂的「重文輕武」,即是「重用文人、輕視武人」:

「強幹弱枝」的國策造成的另一病象是重文輕武,這病象自太宗時起日益顯著。由於宋室信用文人,科舉為世所重,成為士人競趨的對象;相反的,軍人遭受卑視,其素質及社會地位,也因而日益低落;宋代的兵多而弱,與此大有關係。<sup>21</sup>

據此,傅氏認為「重文輕武」是「強幹弱枝」之策所造成的結果 之一。由於宋廷施政對文人、武人採取差別待遇,不僅造成武人 社會地位的低落,更直接導致宋廷的「積弱」之局。

綜上而論,從錢穆、方豪到傅樂成三位先生,宋代「重文輕 武」的內涵似乎逐漸明確而具體。不過,三人對於「重文輕武」

<sup>20</sup>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540。此書最早完成於1939年,此處為2006年版的頁碼。

<sup>114-129</sup> 

<sup>&</sup>lt;sup>21</sup> 傳樂成,《中國通史》(臺北:弘揚圖書有限公司,2005),頁 529。此書最早完成於1960年,1977年完成增訂,是故三書中以此成書最晚。又,此處所載為2005年版的頁碼。

一詞究竟是種政治局勢、家訓還是別的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卻意見不一。即便如此,由於三人的著作皆為研讀中國史、宋史的重要主臬,在我國許多大學的歷史課程皆具有相當的影響力。<sup>22</sup>是故,宋代「重文輕武說」很可能因此逐漸成為解釋宋代文武關係的主流論述。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宋代「重文輕武說」是個具有清楚內涵的解釋典範呢?在接下來的三節,筆者將討論宋代「重文輕武說」的三個疑難,並試著提出個人的檢討與看法,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此議題投入更多關注。

### 三、宋代「重文輕武說」是否具備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

如前所述,許多學界先進宣稱「重文輕武」是宋代立國以來的「政策」。但是,研究者在使用此名詞時,經常未予其明確定義,彷彿學界對此已存在普遍接受的共識。<sup>23</sup>然而,若仔細審視此說法,我們將會發現學界時常既未說清楚「重文輕武」何以是個「政策」,更有甚者,就連「重文輕武」的內涵,似乎都缺乏統一的清楚定義。曾瑞龍檢討宋代「重文輕武」的說法,並發現過去學界對此問題已有四種不同的觀察角度:

所謂「重文輕武」現象,雖曾被提高到「國策」的水平來探討,但嚴格的研究著作其實不多。在史實上,這項政策由何人提議,有無經過討論,何時開始推行等等問題,不像「強幹弱枝」和「先南後北」那樣有較為明確的答案。何況「輕武」是長期「重文」的後果;還是一方面常文,另一方面有意圖地抑武,好像也欠缺深入討論。過往對於「重文輕武」的討論,據筆者限於條件和水平所作的不完全歸納,大致有下列幾種了解。第一種主張認為宋代

<sup>22</sup> 時至今日,我國許多大學在教授中國通史課程時,仍以錢著《國史大綱》、傳著《中國通史》作為指定教科書。至於方著《宋史》,雖然影響力略小於前述二書,仍是學習宋史的重要參考書籍。

<sup>23</sup> 例如王曾瑜雖然宣稱重文輕武是宋代的傳統國策,卻沒有對此名詞加以定義,見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區分和文臣統兵〉,《中州學刊》2 (鄭州,1984.2),頁107-111、120,特別是頁107。

「強幹弱枝」、「重文輕武」二大國策有內在聯繫,核心在於「收兵權」。可是在討論具體史實時,史家仍偏重別崇儒動後者則匆匆帶過,……另一種觀點標明北宋曾經以常儒或在文政策加強其統治,……這種看法能落實到具體制度來解釋「崇儒」或「右文」的政策,但對於「輕武」「如策份量的討論。第三種看法基本上不否定宋代有更文驗同樣份量的討論。第三種看法基本上不否定宋代有更文驗同樣份量的討論。第三種看法基本上不否定來代有更重文版行政策,但同時認為武官也屬於統治者的立意是不管政策,也可能認為宋初統治者的立意是不管政策,並引用文臣以行文治,是使文、武各安其位,不是刻意打擊或貶抑武人。24

由此可見,宋代是否存在著「重文輕武」的「政策」,以及「重文輕武」的觀念又是以何種方法體現,過去的研究成果不是語焉不詳,否則就是缺乏清楚的共識。首先,在宣稱「重文輕武」是宋代的「政策」之前,應該定義何謂「政策」?是要明文記載者才能稱為政策嗎?還是不成文的潛規則也可稱作政策呢?「重文輕武」對於宋人來說,到底是種政策(policy),還是只是種理想(ideal)呢?舉例來說,北宋中期所建立的經略安撫使制度,由於多以文臣擔任經略安撫使,很容易被視為宋代在「重文輕武」觀念下所建立的「政策」。<sup>25</sup>一些宋人留下的奏議,似乎可以證實此類說法,如劉摯(1030-1097)於元祐元年(1086)所上的〈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一文便有以下論述:

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sup>26</sup>

<sup>&</sup>lt;sup>24</sup> 曾瑞龍、趙雨樂合寫,〈唐宋軍政變革史研究述評〉,收於《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00-2000)》,頁 165-228,特別是頁 186-188。此文雖是曾瑞龍、趙雨樂二人 合寫,曾氏主要負責中、英文論著的部分。是故,此處評論當為曾氏的意見。

<sup>&</sup>lt;sup>25</sup> 如陳峰即認為經略安撫使制度將「『以文馭武』之策貫徹到各地統軍系統之中」,見 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89-250。

<sup>&</sup>lt;sup>26</sup>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點校本),卷65,

據此,身處北宋中晚期的劉摯雖然並未明言其追溯的是哪個「祖宗」,卻宣稱不以武人為大帥是祖宗以來的成法。與此相似,任伯雨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所上的〈上徽宗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一文也有類似言論:

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係,不得不然。及至太宗以後,迤邐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為子孫萬世之計也。<sup>27</sup>

與劉摯稍有不同的是,任伯雨明確指出自太宗(939-997,976-997 在位)以後,有鑒於唐代藩鎮跋扈的歷史教訓,出現了不以武臣擔任要郡主帥的「祖宗家法」。但是,只要稍微瀏覽一下史籍,便可發現太宗以後諸帝,仍經常以武臣擔任戰事主帥或是諸路帥臣。<sup>28</sup>由此可見,劉摯、任伯雨所言未必屬實,很可能只是為了爭取皇帝認同所採取的策略性論述。<sup>29</sup>是故,欲用此類政治語言作為支持宋代曾落實「重文輕武政策」的證據,筆者認為有待商権。正如曾瑞龍所說,目前的學術成果對於「重文輕武」是否是個「政策」,尚無法提供明確的答案。如果無法清楚定義何謂「政策」,與其宣稱「重文輕武」是個「政策」,倒不如主張「重文輕武」是某些文人的「理想」,相信後者的說法則相對不具爭議。

其次,則是學界對於「重文輕武」一詞的用法,似乎仍然缺乏共識。舉例來說,此處的「文」、「武」二字,究竟是指文臣武將、文事武略,還是兩者兼有?所謂的「輕」、「重」又是從誰

<sup>〈</sup>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 頁724-725。

<sup>&</sup>lt;sup>27</sup>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65,〈上徽宗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頁727。

<sup>28</sup> 例如,仁宗曾任命武臣狄青擔任討伐儂智高的主帥。神宗朝尤其明顯,不僅以武臣郭逵擔任征伐交趾的主帥,元豐年間五路伐夏時,諸路主帥更全是武臣(包含王中正、李憲兩名宦官)。至於以武臣擔任帥臣的詳細名錄,可參考陳峰,〈北宋各路帥臣文武官對比名錄〉,收於《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頁229-248。

<sup>29</sup> 李立曾精闢地指出宋人寫作奏議,時常有其固定的論述套路:「其通常寫作方式,大多首先冠以某種抽象的政治原則、理想模式或真實的歷史教訓,接著指出現在的某事違反或背離了上述『真理』,然後提出改正建議,並說明不改正的嚴重後果。」見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頁35。

(皇帝、士大夫,還是一般民眾)的視角出發?換句話說,以往對於「文」、「武」所指涉的具體內容為何,以及「輕」、「重」的主詞又是何人,學界經常缺乏清楚的定義,就直接使用此名詞開展論述。一般來說,所謂的「重文輕武」,似乎是如同錢穆、傅樂成二位先生所指出的,借指統治者重用文人、輕視武人的現象。然而,這個說法並不是「重文輕武」一詞的唯一解釋。漆俠(1923-2001)在〈宋太宗與守內虛外〉一文,便對此四字增加了新的定義:

重文輕武的涵義是,重文事,輕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將第二位,絲毫不重視養兵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30

客觀地說,漆氏對於「重文輕武」的定義仍然十分模糊。除了指涉統治者重視文臣、輕視武將之外,似乎更可擴大解釋成輕視武略、養兵,彷彿宋代完全不重視軍事相關的一切事務。但是,已有研究者指出北宋諸帝不僅致力維持龐大軍隊,許多文臣更是「喜談兵」,要說宋代輕視武備、軍隊顯然不符事實。<sup>31</sup>或許正因如此,漆氏的弟子陳峰一方面盛讚師說「可謂切中要害,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另一方面,卻又提出「崇文抑武」四字,試圖對「重文輕武」一詞加以修正。陳氏認為:

基於宋代文官、武將之間權力失衡和大量抑制武將的具體事實,更重要的是宋統治者不僅僅是一般的重視文教事業和輕視武略,而是長期側重於以意識形態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國,有意抑制武將群體和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及

<sup>30</sup> 漆俠,〈宋太宗與守內虛外〉,收於田餘慶主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 161-170。

<sup>31</sup> 宋衍申,〈是「重武」不是「輕武」——談北宋的一項基本國策〉,《光明日報》(北京),1985年9月4日,頁3。值得注意的是,宋衍申這篇文章所謂的「武」是指武備、武事,而非武人。也就是說,他認為宋代「重武」是指重視武備、武事,而不是指重視武人。據此,我們可看到不同學者筆下的「文」、「武」二字,其指涉的內容時常並不相同,實在很難說「重文輕武」一詞已具有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

社會生活中的影響,這種主導思想落實為治國方略,而貫穿於宋朝歷史以及各種方面之中。因此,本人在前賢「重文輕武」認識的基礎上,依據歷史發生的實際全過程,提出「崇文抑武」的概念。本人認為提出「崇文抑武」,概念,不僅僅是改變了個別字眼,而是對「重文輕武」概念的發展,既可以避免宋朝對軍隊及武備輕視的理解上的誤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宋朝的統治思想及治國方略,更高的層面上透視當時「抑武」的動因及其影響。32

陳氏不僅把「崇文抑武」一詞抬高到「治國方略」的高度,其對「崇文抑武」的定義顯然也與漆俠的論述有所出入。就筆者個人所見,漆氏對於「重文輕武」的解釋雖然並非學界主流,然而,研究者時常沒有清楚定義「輕」、「重」的主詞是誰,「文」、「武」指涉的內容為何也是事實。另外,若仔細審視「崇文抑武」一詞,會發現此名詞的涵義與「重文輕武」一詞實不相同。

陳氏所謂的「抑武」,應如同引文所說,意指宋代統治者有意 地抑制武人的影響力。但是,正如同「重文」與「輕武」沒有必 然關係一般,<sup>33</sup>「抑制武人」與「輕視武人」也不見得可以劃上等 號。例如,學界經常以宋太祖(927-976,960-976 在位)「杯酒釋 兵權」、任命朝臣出守列郡等事件說明宋初對於武人的限制。<sup>34</sup>然 而,宋太祖也開啟了北宋皇室與武將聯姻的風氣,更長期任用武 臣負責邊防事務,<sup>35</sup>以上種種,完全看不出太祖有輕視武將的傾 向。更有意思的是,以往被認為支持文人價值觀的太祖、太宗, 其發言有時卻明顯帶有輕視文人的意味,顯示他們與文臣的關係

<sup>32</sup> 陳峰、〈試論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頁2。

<sup>33 「</sup>重文」不見得必定導致「輕武」,見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象為中心〉,《清華學報》,36:2(新竹,2006.12),頁 295-344,特別是頁338。

<sup>34</sup> 方豪,《宋史》, 頁22-24。

<sup>35</sup> 關於宋太祖與諸將的聯姻,可參考 Peter Lorge, "The Northern Song Military Aristocracy and the Royal Family," pp. 37-47. 太祖對邊將的重用,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以下簡稱《長編》),卷11,太祖開寶三年八月庚寅條,頁249;卷17,太祖開寶九年十一月庚午條,頁384-385。

並非總是如同後人想像的那麼親密。<sup>36</sup>由此觀之,所謂「重視」、「輕視」只是相對而言。對皇帝來說,不論文臣、武臣,都是維持國家運作不可或缺的人員,很難說皇帝必定對哪個群體有所偏好。鄧小南即指出對於太祖、太宗而言,「文」、「武」之別並非任用的唯一考量,「作興士風、端正君臣之道,才是帝王所更加關注的。」<sup>37</sup>事實上,統治者任用某人與否,未必與其擔任文臣或武臣有關,而是因為其能得到皇帝的信任。<sup>38</sup>研究者在討論某些人事爭論時,必須避免先入為主的「重文輕武」概念影響判斷,如此,方能得到更接近事實的歷史解釋。<sup>39</sup>

綜上觀之,顯然學界對於宋代是否輕視武人武事、<sup>40</sup>「重文輕武」所指涉的內涵為何仍有不同意見,很難說已經取得了普遍的共識。是故,以後學界如果仍要使用「重文輕武」一詞進行論述,最好先對該名詞進行清楚的定義,以免讀者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在下一節,筆者將從動態視角觀察兩宋三百年間「重文輕武」想法的發展,並檢驗此想法是否始終一成不變。

36 例如,太祖曾對思念後周世宗的王著有以下評論:「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為也!」見宋·夷門君玉,《國老談苑》,收於《全宋筆記》第二編(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點校本),卷1,頁174-175。類似的言論,見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p. 109, pp. 117-118.鄧小南則發現宋太宗雖然確立文臣政治,其對文臣卻經常露出輕蔑、猜忌的態度,見氏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72。

<sup>37</sup> 鄧小南,《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頁168。

<sup>38</sup> 例如,被認為文臣勢力高漲的仁宗朝,光是慶曆三年就至少發生了兩起朝廷任命武臣(郭承祐、李昭亮)擔任一路主帥的事例,見《長編》,卷 142 ,慶曆三年七月,頁 3401-3402;卷 144 ,慶曆三年十月,頁 3476-3478。有意思的是,這兩名武臣都具有外戚身分,而反對者歐陽修並沒有以「祖宗不以武人為大帥」作為反對兩人就任的理由。由此觀之,筆者認為以下兩點值得留意:(一)若宋代真有不以武人為大帥的「祖宗之法」(如劉摯、任伯雨所宣稱的),歐陽修沒有理由不提此事。是故,劉摯、任伯雨所言很可能並非事實。(二)對皇帝來說,文武之別並非舉用官員與否的唯一考量,能否獲得皇帝的信任亦是選任的重要依據。

<sup>39</sup> 陳峰即經常將「宋代重文輕武」作為論證的依據,李立對此有鞭辟入裡的批評,見 〈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頁31-32。

<sup>&</sup>lt;sup>40</sup> 如Peter Lorge 便懷疑宋代「重文輕武說」,見"The Northern Song Military Aristocracy and the Royal Family", pp. 37-47;伍伯常也認為「重文」並不必然導致「輕武」,見〈北宋初年的北方文事與豪俠〉,頁298-301、338。

## 四、兩宋的文武關係是否在三百年間一成不變?

許多學者論述宋代「重文輕武」的現象時,似乎經常認定此為兩宋三百餘年的共同現象,毫無任何動態變化可言。在前面的章節,筆者已列舉錢穆、傅樂成、漆俠三位先生的例子,此處再舉一例:先前提及陳峰主張「崇文抑武」是宋代的「治國方略」,此四字實可說是陳氏著作的核心論點,屢見於其文字之中。在論述經略安撫使制度時,陳氏雖以另一名詞——「以文馭武」進行討論,該文仍反映了其「崇文抑武」的基本預設。陳氏認為,經略安撫使制度實將「『以文馭武』之策貫徹到各地統軍系統之中」,但他又發現北宋中期以後,宋廷仍經常讓武將擔任軍事任務的主帥。是故,他宣稱此現象為宋廷「以文馭武」策略的「局限性」,試圖為自身說法解套。41然而,此論點正暴露了陳氏說法存在嚴重缺陷的事實。在陳氏的筆下,彷彿自宋初即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基調,此基調在兩宋三百餘年並無重大變化。是故,當反例出現時,陳氏必須以別的說法自圓其說。42

不過,最近的學術成果卻提出了不同於陳氏論點的反證。羅文雖然仍認為「重文輕武」、「以文馭武」是宋代的「國策」,但其亦指出此「國策」是逐步成形,並非在北宋建國之初即宣告完成。<sup>43</sup>與此相近,Peter Lorge 也指出宋太祖、太宗、真宗(968-1022,997-1022 在位)等人看待武事的態度其實相當不同。<sup>44</sup>眾所周知,神宗(1048-1085,1067-1085 在位)對於武事的積極程度,顯然也與仁宗(1010-1063,1022-1063 在位)、英宗(1032-1067,1063-1067 在位)相差極大。<sup>45</sup>到了南宋時期,孝宗(1127-

<sup>41</sup> 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頁189-250。

<sup>42</sup> 李立對此已有相當深刻的批評,見註23。

<sup>43</sup> 羅文,〈北宋文臣統兵的真相〉,收於漆俠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九屆年會編刊》(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頁27-47。

Peter Loege, "The En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in Peter Lorge ed.,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27-241.

<sup>45</sup> 張元,〈從王安石的先王觀念看他與宋神宗的關係〉,收於《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三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273-299,特別是頁280-288。

1194,1162-1189 在位)亦是銳意武事,其作風與南宋諸帝頗不相同。<sup>46</sup>換句話說,不同皇帝在位,其看待文臣武將、文事武略的態度往往有所差異,並非總是一成不變,而這點以往則常為學界所忽略。

除了皇帝的意向外,宋代各地域看待武事的態度也有所差異。王昌偉研究五代到清末的關中士人,並發現在宋代,由於陝西位居前線,關中士人有更多機會、也更願意透過武事建立功業;<sup>47</sup>伍伯常也發現河北民風豪邁尚武,更有不少文士受此風氣影響,作風「好尚意氣」。<sup>48</sup>事實上,除了河北、陝西之外,同樣位居前線的河東路「其俗剛悍而朴直」,而位於京東路的登、萊、高密等地「民性愎戾而好訟鬥」。<sup>49</sup>也就是說,隨著地區的不同,民情好尚也會有所差異。宋代繼承晚唐、五代的立國形勢,主要外患皆位於北方。由於北方諸路皆與外敵比鄰,或許因為如此,導致邊民普遍具有堅忍強悍的性格。由此觀之,認為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將武略的想法足以概括當時宋廷各地的風俗民情,似乎並不恰當。由於各地風俗的差異,今後學界在使用「重文輕武」這類過度概括的名詞時,應該要更為小心。

綜上而論,隨著不同皇帝在位、不同地區好尚,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將武略的想法在這三百年間其實並非一成不變。研究歷史,所憑藉的史料時常只是某些地區或某些群體(主要為上層文士)認知的反映。以這個不知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認知去界定整個時代、整個國家的風氣、想法,顯然是極為危險的。由此觀之,能否將宋代「重文輕武說」視為思考問題的有效前提,著實

<sup>46</sup> 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3(臺北,1986.9),頁553-584。

<sup>47</sup> Chang Woei Ong (王昌偉),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21-75. 曾瑞龍也注意到宋代的關中存在一批作風與一般文人迥異、熱衷邊事的「豪俠之士」, 見氏著, 《拓邊西北:北宋中晚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 2006), 頁15-44。

<sup>48</sup>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事與豪俠〉,頁301-307。

<sup>&</sup>lt;sup>49</sup>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卷85,〈地理一〉,頁2112; 卷86,〈地理二〉,頁2138。

令人懷疑。必須說明的是,筆者並不否認宋代部分皇帝、士大夫 以至於民眾之間確實存在著重視文臣文事、輕視武將武略的理 想,但這個理想有其時間性與地域性,無法代表兩宋三百餘年、 全國各地的普遍情形。或許,研究者應避免把「重文輕武」視為 研究宋代的萬能鑰匙。唯有如此,才不會將任何現象都過度解釋 為「重文輕武」的表現,然後再以這些表現強化「宋代重文輕 武」的印象,形成一種「重文輕武既是原因,也是結果」的弔詭 現象。

在本節,筆者試圖證明兩宋的文武關係實有其時間、地域的 差異,不該一概而論。那麼,宋代文士又是如何看待武人、武事 呢?長久以來,宋代文士輕視、壓抑武人武事的形象似乎深植人 心。在下個章節,筆者將討論輕視武將、武事是否為宋代文人的 共識?若否,則過度強調此名詞在宋代的作用是否恰當,或許值 得學界再三思考。

### 五、輕視武人武事是宋代文人的共識嗎?

如前所述,早自錢穆的《國史大綱》,就已認為「讓文人壓在武人的頭上」是宋廷傳世的「家訓」。到了方豪的《宋史》,更是以「重文輕武」一詞對此現象加以概括。此後,「重文輕武」似乎就成為宋代揮之不去的「時代特色」。但是,持此論者通常忽略了兩件事:(一)宋朝並非自立國之初即定下了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人武略的基調,此現象在宋代實是逐步發展而成,且隨著不同皇帝在位、不同地區好尚有所差異。(二)即使在文士群體中,不同文士看待武人武事的態度亦是相差甚大。在上一節,筆者已對第一點作了詳細的解釋。接下來,筆者要對宋代文人看待武人、武事的態度進行分析。

無須諱言,在宋代文人的奏議、筆記中我們經常可以找到當時文士輕視武人、武事的言論,這也符合目前學界對於宋代文武關係的認識。然而,如同筆者在先前所提及的,文人輕視武人、武事的言論絕非宋代獨有的現象。再者,這些「輕武」的言論往

往只反映了部份文人的想法,要說此為當時所有文人的共識,顯然有待商榷。近來,已有研究者指出宋代文人的奏議經常出現武事的主題。<sup>50</sup>另外,不少宋代文人喜談兵事、好讀兵書,甚至有軍事著作傳世。例如,陳貫(968-1039)、蘇洵(1009-1066)、蕭注(1013-1073)、沈起(1017-1088)、徐禧(1043-1082)、張叔夜(1065-1127)、張所(生卒年不詳)、陳亮(1143-1194)、董槐(?-1262)等文士在當時皆以「喜言兵」著稱,《宋史·藝文志》更收錄了許多宋代文人的軍事著作。<sup>51</sup>是故,宋代實有不少文人對武事懷抱著強烈的興趣,而這方面以往則較少為學界所留意。<sup>52</sup>

事實上,北宋自立國以來,隨著文官群體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以往長期由武官群體把持的軍務主導權也隨之移交到文臣之手。53不論是知州,還是一路的最高軍事長官,時常多由文人出

<sup>50</sup> 宋衍申,〈是「重武」不是「輕武」〉,頁3。

<sup>51</sup> 這些文士的事蹟,見《宋史》,卷303、〈陳貫傳〉,頁10047;卷334、〈徐禧傳〉,頁10724;卷334、〈蕭注傳〉,頁10732;卷353、〈張叔夜傳〉,頁11140;卷436,〈陳亮傳〉,頁12929;卷414、〈董槐傳〉,頁12428;宋·曾鞏,《元豐類稿》(四部叢刊初編第18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41、〈蘇明充哀詞〉,頁261;宋·沈遘等,《沈氏三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廣編第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40、〈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頁197;宋·李心傳,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點校本),甲集卷11、〈招撫使〉,頁219。另外,關於對夏戰爭與北宋中期文人談兵風氣的關聯,見劉春霞,〈李元昊「僭號」與北宋中期文人談兵論析〉,《蘭州學刊》,11(蘭州,2008.11),頁195-197。關於宋代文人的軍事著作,可參見《宋史》,卷207、〈藝文六〉,頁5282-5288。

<sup>62</sup>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道學經常遭受「空談心性」的指責,南宋的道學型士人(如朱熹、陸九淵、陳亮等)卻非常注意武事,更在南宋的北伐議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相關研究,見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這些負責軍務的文臣,常被時人冠以「儒將」、「儒帥」、「才兼文武」等名詞。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文獻中,這些名詞大多專用於形容文臣,頗有強調其以文臣身份參與、精通武事之意。這種「才兼文武」的宣稱,使得這批統兵文臣的形象既不同於「粗魯無文」的武將,亦與任職內地、未經戰事的文士有別。關於「儒將」、學界已有研究成果,見劉子健,〈從儒將的概念說到歷史上對南宋初張浚的評論〉,收於楊聯陞主編,《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國史釋論》(臺北:食貨,1988),頁481-490。

任。54甚至,就連專管軍務的樞密院,其長貳組成也逐漸變成文人 多於武人。<sup>55</sup>部分文官平時必須處理軍政事務,使得他們不可能與 武事完全脱節,也必須經常與轄下的武官有所互動。另外,隨著 投入科舉的文士人數不斷增加,多數文士即使獲得功名,也只能 在文官序列中緩慢升遷,甚至在致仕之前還無法擔任中級文官。 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文官不僅不輕視武事,甚至反而把武事當 作建立功業、尋求迅速升遷的手段。56舉例來說,在對外戰爭頻繁 的神宗朝,統兵文臣蔡挺(1014-1079)由於對夏作戰有功,短 短七年時間便從代理帥臣(權知慶州)的身份升遷至樞密副使; 另一位統兵文臣王韶(1030-1081)的經歷則更具代表性:由於 經略吐蕃諸部、收復熙河路有功,他從擔任隸屬於帥臣的秘書職 (管幹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升遷至樞密副使只花了六年時 間。<sup>57</sup>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且學界已有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可供 參考。58雖然,對於多數文官而言,由於參與武事風險甚高,長年

司馬光曾言:「國朝置總管、鈴轄、都監、監押爲將率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 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見宋,司馬光,《溫國 文正司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第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52, 〈請罷將官劄子〉,頁393。據此,此時知州當為一州之軍事首長,知縣則為一縣 之軍事首長。是故,文臣在出任知州、知縣之時,經常必須兼管州縣之軍、民政事 務。以文臣擔任知州的傾向,宋太祖時就已出現,太宗則繼承此作法,見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pp. 110-113. 關 於文臣出任一路軍事首長,經略安撫使制度的出現是一關鍵,見羅文、〈北宋文臣 統兵的真相〉, 頁27-47; 吳挺誌,〈北宋中後期的文臣統兵:以陝西沿邊五路經略 安撫使為例(1038-11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頁107-146。

<sup>&</sup>lt;sup>56</sup> Paul Jakov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 (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 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s, 1068-1126," in Patricia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蔡挺事蹟,見宋·張方平,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點校本),卷40,〈宋故推誠保徳功臣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判南京留 司御史臺上護軍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 蔡公墓誌銘〉,頁747-755。王韶事蹟見《宋史》,卷328,〈王韶傳〉,頁10579-10582;宋·王稱,劉曉東等點校,《東都事略》(濟南:齊魯書社,2000點校 本), 卷82, 〈王韶傳〉, 頁690-693。

黃寬重,〈賈涉事功述評 —— 以南宋中期淮東防務為中心〉,《漢學研究》,20:2

出任邊務、甚至轉任武職絕非他們樂見的結果。<sup>59</sup>但是,我們也不該忽略對於一些想追求晉升的文臣而言,投入武事亦是極具吸引力的選項之一。筆者認為,宋代文臣看待武事的矛盾態度,正好提醒我們此問題的複雜性,絕非所謂的「輕武」二字如此簡單。

最後,則是宋代文人看待武將的態度。長久以來,在多數宋代研究者的筆下,宋代文武相輕、衝突的那一面總是被不斷強調。不過,伍伯常的研究卻指出宋初實有不少武將出身文官家庭,一個仕宦家庭更經常同時存在文官成員與武官成員。據此,伍氏提出了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

一個家庭之中,同時存在文官武將,而且是父子之親,以 及前文所論的兄弟之倫,文武能否在這類家庭之中尖銳地 對立起來,倒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問題。<sup>60</sup>

值得注意的是,仕宦家族同時擁有文、武職家族成員並非僅見於 宋初的現象。透過蔭補、換官(文官轉武職或武官轉文職),甚至 是招婿、子弟應考科舉,閱讀宋人墓誌,經常能看見一個家族同 時擁有擔任文、武官的成員。再者,由於文官必須經常與武臣共 事,即使兩個群體各自擁有自己的文化認同,雙方仍會或多或少 產生交流。文臣與武將對於彼此的認識、觀感絕非一成不變。61必

<sup>(</sup>臺北,2002.12),頁 165-188;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衡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新史學》,17:2 (臺北,2006.6),頁 1-54;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第三篇第二章〈武功與文事——程氏家族由族而家的發展〉,頁227-249;黃寬重,《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2012),第三編第一章〈令決於中——北宋晚期程氏父子對廣西的經略〉,頁173-193。

<sup>59</sup>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pp. 151-153;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衛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頁1。除了晚宋的例子外,宋初亦有文臣抱怨投入武事不僅要與家人分離,以文職身分參與邊務的薪俸亦不高。甚至,無論主持戰事是勝是負,都可能替政敵製造攻計的藉口,見《長編》,卷65,景德四年六月癸丑,頁1463-1464。

<sup>60</sup>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文武界線——以出身文官家庭及文士背景的武將為例〉,收於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編,《宋學研究集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頁32-43,特別是頁42-43。

<sup>61</sup> 李貴泉即發現余靖對狄青的態度因彼此共事而從輕視轉為敬佩,見李貴泉,〈宋朝 「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與武將的關係〉,頁52-61。

須再次說明的是,筆者無意否認宋代亦有文臣武將相輕、衝突的歷史事實。但是,研究者在描述這些文武衝突的同時,也不應忘記當時亦存在著許多文武交流、合作的案例。翦伯贊(1898-1968)有段話頗發人深省,茲引於下,權作本節結尾:

歷史是具體性的科學,論證歷史,不要從概念出發,必須從具體的史實出發,從具體史實的科學分析中引出結論。 不要先提出結論,把結論強加於具體的史實。<sup>62</sup>

正如筆者所指出的,宋代文人其實是個相當多樣而複雜的群體, 很難以任一名詞對所有成員的好尚加以概括。再者,即使是同一 個人,其看待武事的態度也可能隨著時間、環境而有所變化。筆 者認為,此現象正揭示了宋代文武關係議題的複雜性。是故,認 為宋代文人「輕視武人、武事」的解釋典範實有其侷限性存在, 不應當成研究宋代文武關係的必然前提。反之,應該盡量不帶任 何偏見地解讀史料。如此,才能得到更貼近事實的歷史解釋。

### 六、結論

研究歷史,很容易將某些歷史人物的詮釋擴大解釋成時代特色,宋代「積貧積弱說」、「重文輕武說」都是個明顯的例子。透過以上論證,我們看到宋代「重文輕武說」的解釋典範如何被提出、深化。但是,如同筆者所指出的,「重文輕武」一詞雖然被學界長期使用,至今仍缺乏一個學界普遍接受的共同定義。其次,雖然筆者並不否認宋代存在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將武略的現象,但不同皇帝、不同地區看待文武的態度並不相同。以往的研究總是將兩宋三百餘年視作一成不變的整體,忽略了此現象有其動態發展,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第三,宋代文人是個相當多樣、複雜的群體。不同文人看待武人、武事的態度可能相差甚

<sup>62</sup> 翦伯贊,〈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收於北京市學史學會編,《北京市歷史學會第一第二屆年會論文選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64),頁20-35,特別是頁34。

大;即使是同一文士,其看待武人、武事的態度也可能相當矛盾,且有機會隨著參與武事、與武人共事而有所改變。部分文人不僅與武人往來密切,對他們來說,武事更可以是尋求迅速升遷的終南捷徑。筆者認為,文士看待武人、武事的態度如此多樣,正反映了宋代文武關係的複雜性,絕非「重文輕武」一詞能夠輕易概括。

如同筆者於前言所提及的,中國史上許多朝代發展到後來, 時常走上重視文人文事、輕視武將武略的道路,此現象絕非宋代 的「時代特色」。再者,此現象實為動態的發展過程,「重文輕 武」一詞並不足以代表所有時期、所有地區、所有文人的共同意 見。也就是說,宣稱「重文輕武」是宋代的特色,可說是個既有 效、亦無效的歷史解釋。同樣地,若要宣稱「重文輕武」是宋代 的政策,也應該對此名詞何以是個「政策」加以說明。最後,已 有前輩學者指出即使宋代在面臨遼、金、蒙古等強大外患時難以 收復失地,其國力亦足以長期自守。顯然,宋代「重文輕武說」 過度簡化了當時的文武關係,亦嚴重低估了宋代的國防戰力。經 過以上論證,筆者認為宋代「重文輕武說」其實是個具有明確侷 限性、亟待修正的解釋典範。是故,筆者希望在此誠摯地呼籲, 研究者在思考宋代的相關問題時,應避免將「重文輕武」視為不 證自明的有效前提。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陷入尋找案例以配合 「重文輕武說」的思想窠臼。越是研究歷史,越是應該明白歷史 的複雜性,絕非幾個概念能夠完全概括。筆者認為,宋代「重文 輕武說」正向我們揭示此點。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文獻
- 唐·杜牧,何錫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 2007點校本。
- 宋·王稱,劉曉東等點校,《東都事略》,濟南:齊魯書社,2000 點校本。
-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第 46 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夷門君玉,《國老談苑》,收於《全宋筆記》第二編(一),鄭 州,大象出版社,2004點校本。
- 宋·沈遘等,《沈氏三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廣編第 35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宋·李心傳,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點校本。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
- 宋·張方平,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點校本。
- 宋·曾鞏,《元豐類稿》,四部叢刊初編第 188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79。
-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點 校本。
-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
- 明·左光斗,《左忠毅公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7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2007點校本。
- 明·張煌言,《張忠烈公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
- 清·全祖望,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0 點校本。

- 清·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51 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萬有文庫第2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二、專書

- 王仲孚主編,《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2》,臺北:康熹文化,採行民國100年課綱。
- 方 豪,《宋史》,臺北:文化大學出版部,2000。
- 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 田 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 田餘慶主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高明士主編,《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2》,臺南:翰林出版,採行民 國100年課綱。
- 張元、李孝悌合著,《簡明中國歷史》,臺北:龍騰文化,2002。
- 陳 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4。
- 陳 峰,《宋代軍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 仁書局,1994。
-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晚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 局,2006。
- 傅樂成,《中國通史》,臺北:弘揚圖書有限公司,2005。
-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 黃寬重,《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2012。
- 楊聯陞主編,《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國史釋論》,臺

- 北:食貨,1988。
- 漆俠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 第九屆年會編刊》,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
-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 2006。
- 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1987。
- 錢 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Ebrey, Patricia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 Fang, Cheng-hua (方震華).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 Lorge, Peter ed.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Ong, Chang Woei (王昌偉).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三、論文

- 王曾瑜, 〈宋朝的文武區分和文臣統兵〉, 《中州學刊》, 2 (鄭州, 1984.2), 頁107-111、120。
- 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衡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新史學》,17:2(臺北,2006.6),頁1-54。
- 方震華,〈傳統領域如何發展? 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臺大歷史學報》,48(臺北,2011.12),頁165-184。
- 田耕宇,〈宋代右文抑武政策對宋型文化形成的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6:2(成都,2005.2),頁 209-

216 •

-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 象為中心〉,《清華學報》,36:2(新竹,2006.12),頁295-344。
-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文武界線——以出身文官家庭及文士背景的 武將為例〉,收於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編,《宋學研究集 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頁32-43。
- 吳挺誌,〈北宋中後期的文臣統兵:以陝西沿邊五路經略安撫使為例(1038-11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李貴彔,〈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與武將的關係〉,《中山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4(廣州,2002.4),頁52-61。
- 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33:3(西安、2004.5)、頁75-78。
- 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3(臺北,1986.9),頁553-584。
- 高明士,〈唐朝的文和武〉,《文史哲學報》,48(臺北,1998.6), 百145-167。
- 張元,〈從王安石的先王觀念看他與宋神宗的關係〉,收於《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三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 的轉變 (1163-120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8。
- 黃寬重,〈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歷史月刊》,8(臺北,1988.9),頁64-69。
- 黃寬重,〈賈涉事功述評──以南宋中期淮東防務為中心〉,《漢學研究》,20:2(臺北,2002.12),頁165-188。
- 翦伯贊,〈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收於北京市學史學 會編,《北京市歷史學會第一第二屆年會論文選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64,頁20-35。

- 劉春霞、〈李元昊「僭號」與北宋中期文人談兵論析〉、《蘭州學刊》、11 (蘭州,2008.11)、頁195-197。
- 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歷史研究》,5(北京,1999.10),頁114-129。
- Lorge, Peter. "The Northern Song Military Aristocracy and the Royal Family," *War and Society*, 18:2 (October, 2000), pp. 37-47.

#### 四、報紙

宋衍申,〈是「重武」不是「輕武」——談北宋的一項基本國策〉,《光明日報》(北京),1985年9月4日,頁3。

# Review the Thesis of Song Dynasty's 'Zhongwen Qingwu'

Song, Yan-sheng

####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years, Song Dynasty's 'weak force' has long been discussed by scholars. When researchers attempted to answer this phenomenon, they usually attributed it to Song Dynasty's 'Zhongwen Qingwu' policy. As time goes by, the thesis of Song Dynasty's 'Zhongwen Qingwu' was seemingly raised as a paradigm which could interpret Song Dynasty'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is article, I strive to analyze how the thesis was developed, and address some questions to this thesis in following themes: Have most historians come to a consensus about the thesis? Did th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lways remain static in Song Dynasty? Whether Song literati generally despised military people and affairs? Actually, it is true that some Song people emphasized literati/civil affairs, and disdained military people/affairs; however, the phenomenon did not only exist in Song Dynasty. For example, similar situation appeared in Tang Dynasty too. In addition, the term of 'Zhongwen Qingwu'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actively-debated. When discussing related issues of Song Dynasty, we had better not to consider the thesis as a prerequisite, so that we would be capable of avoiding some falsehoods which the thesis brings about.

**Key words:** Song Dynasty, Zhongwen Qingwu, Chongwen Yiwu,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olicy